



博雅人文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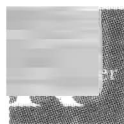
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

Medicine, Society and Culture Reader

余新忠 杜丽红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人文读本

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

Medicine, Society and Culture Reader

余新忠 杜丽红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余新忠,杜丽红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博雅人文读本)

ISBN 978-7-301-21679-8

I. ①医… II. ①余…②杜… III. ①医学社会学-文集 IV. ①R-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8888 号

书 名: 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

著作责任者: 余新忠 杜丽红 主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陈 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679-8/K · 09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31.5 印张 583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导 言

——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

十二年前的现在,正是世纪之交之年,笔者完成了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三年后,经过修订的论文作为中国大陆疾病医疗社会史领域第一部专著正式出版^[1],际会风云,出版之时,恰逢国内 SARS 流行,于是一部非常专门的学术著作顿时成了颇受社会关注的大众读物。由此引发的,乃是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关注、肯定乃至投入。这一切,无疑是我在做博士论文时全然不可能预料到的,当初选择这一课题来做,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对推动社会史研究不断发展的学术追求。而今,瘟疫这类话题的社会热度,随着 SARS 的远去而早已不在,而令人感到高兴的是,疾病和医疗等论题,却在史学界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医疗社会史或医疗社会文化史这样的学科分支,不仅不再令人感到陌生,而且还差不多成了不少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生颇为热衷的研究领域。2003 年以后,基本上每年都至少有两部以上这方面的著作问世,相关的论文亦不时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清史研究》这类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据统计,从 2001 年至今,仅《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上刊出的疾病医疗史论文就有 17 篇。其他刊物刊发的论文无疑更多,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则从第七卷(2006 年)开始,每卷均至少开设一组以上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学者在总结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时,也往往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兴起视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引人注目的重要成绩。比如常建华在较近的社会史研究回顾中指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3]另一篇总结性论文则称:

* 本文在完成初稿后,业师冯尔康教授曾给予重要的指教,刘小朦和张田生同学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谢意。当然,所有的问题和错误均由笔者负责。

[1]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 该刊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年刊,目前由常建华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3] 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89—390 页。

新社会史、重归政治史之外,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史还开拓了不少新领域,成绩较彰的有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人类与疾病相伴随,以往的疾病医疗研究基本属于医学范畴。人类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藉此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这一过去忽略的领域,可谓别开生面。〔4〕

显而易见,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已经在史学界日渐兴起,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不过总的来看,这方面的成果在整个史学论著中,所占的比重仍相当微小,若跟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相比,就更显得薄弱了。〔5〕在当今的中国史学界,它似乎还远算不上是主流研究,有时甚至连正当性都还存在问题。梁其姿教授曾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序言中谈到:“相对于发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医史,中国医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里的‘妥当性’似乎仍受到质疑。近年来我经常被问到我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言下之意,医疗史在中国史里是有点偏门、有点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浅尝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她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与西方的医学相比,中国传统医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中,“从未能蜕变为‘英雄’”。〔6〕她的这一认识,若将其置于整个20世纪以来的历史来看,无疑是极富启益的洞见。不过若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情况似乎又稍有不同。因为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密切,很多的研究者,特别是相对年轻的研究者,大概已较少会只根据某个议题对历史发展的“贡献”的大小来选题。而且,实际上,疾病医疗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特别在SARS的刺激下,更是如此。尽管目下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依然是非主流的研究领域,研究依然十分薄弱,但考虑到它的兴起不过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我们似乎有理由对其后续的发展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相信假以时日,它当会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正如前面谈到的,在目下的中国内地史学界,虽然这一研究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有不少颇具影响的学者将其视为中国

〔4〕 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5〕 这种感受,大概只要稍稍对国际特别是西方学术研究有所关注,就不难获得。在欧美,除了有众多综论性著作和教科书,更大量的是各种具体而深入的专题探究。相关的情况从最近编纂的一本有关医学史理论和方法思考与探索的著作中可得到充分的反映。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同时亦可参阅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和组织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6〕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和组织的》,第3页。

新近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了,而且还将其视为未来史学发展的“潜力股”。比如王先明在评述近年来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史时指出,“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7]常建华则将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视为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四大发展趋势之一。^[8]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和团体,也已经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一研究的支持。比如,在历年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从1999—2011年,共评出历史学的优秀博士论文34篇,其中就有二篇这一领域的论文。^[9]200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六卷《〈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其中的“社会史”卷共收录26篇论文,而医疗社会史的论文就有三篇。^[10]这些无疑反映了史学界不乏对该研究欣赏和支持,也显然有利于激发人们对这一研究关注和投入。

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始于1990年代中期^[11],较早的研究,可以说大多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下展开的,并往往被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方向或新领域。^[12]中国社会史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兴起以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至今仍处于不断更新理念,开拓新领域的持续发展之中。^[13]不过放眼世界,我们则不能不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80年代国内社会史开始兴起之时,在西方,却正在经历文化转向,社会史研究因其过于浓郁的结构主义色彩以及过于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而愈益受到“新文化史”的冲击和挑战。^[14]新

[7] 王先明:《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8] 常建华:《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

[9] 分别是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2002年)和李玉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2006年)。

[10] 这三篇论文为: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曹树基《鼠疫流行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和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1] 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2] 参阅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以及上引文章中有关社会史研究的述评。

[13] 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可以参阅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4—397页;王先明:《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赵世瑜、行龙、常建华:《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的回顾与前瞻》,《光明日报》2009年4月23日第12版;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4] 参阅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历史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米格尔·卡夫雷拉著:《后社会史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文化史是西方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方向或流派,这一研究不再热衷于结构(更遑论规律了)、真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这些以往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特别强调历史现象的建构性与意义的破解和诠释,该研究在美国的开创者之一林·亨特在其主编的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集《新文化史》中谈到:“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就像吉尔兹将破解含义认作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一样。”^[15]他们希望对以往宏大叙事的批评和结构,将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体验呈现于历史的叙事之中。这就像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达恩顿所说的那样:“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寻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16]为此,他们借用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17]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各式各样,使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似乎都对“权力”特别敏感,这正如姜进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的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18]显然,新文化史希望通过文化的自主性的强调和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由于医学是直接处理人的身体异常(包括病变和感觉)的科学和技艺,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建构主义与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和实践的领域^[19],与此同时,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以自己深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医学中的疾病与医疗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

[15]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第11页。

[16] 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17] 关于吉尔兹的深描法,参阅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三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5—347页;关于新文化史的叙事理论,参阅克伦·哈图恩:《文化史与叙事性的挑战》,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第28—42页。

[18] 姜进:《新文化史经典译丛总序》,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第7页。

[19] 对此可以参阅本书收录两篇论文,卢德米拉·乔丹诺娃:《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玛丽·E.费塞尔:《从边际制造意义——新文化医学史》。

(illness) 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20] 这些论述很容易进一步打动和吸引那些受到新史学思潮影响的历史研究者从疾病和医疗入手来展开新文化史的探索。正如前述梁其姿所言,与中国不同,现代医学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医学史研究也有着相当深厚的基础。不过,随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出现,传统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医学史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越来越以意义为中心。在西方新近编纂的一部总结探讨医学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集中,虽然编者极力倡导医学史研究的多元主义,反对对传统医学史的过度批评,但从前言、编排体例以及一些选编的论文中,还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向的不可逆转。^[21] 显然,医疗史研究在西方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受这一趋向的影响,近年来,在西方中国医疗史界,也出现一些具有新文化色彩的研究论著。^[22]

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回国内,则可以发现,类似的文化转向并不曾出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当西方在批判社会史基础上出现的新文化史的影响不断扩展时,国内却正在经历社会史的蓬勃发展,而新文化史在新世纪之前在国内史学界则几无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史学和新文化的相关理论和论著的不断引入,尽管新文化史研究日渐为国内史学界所熟悉,并逐渐开始有人积极践行^[23],但那种将文化史视为是社会史的反动的认识,在大陆史学界一直不曾出现,这与李孝悌所描述的台湾的情况似乎颇为一致。李曾就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述道:“由于台湾的文化史家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对社会史的理论预设,因为有清楚的掌握从而产生强烈的批判,所以从来不曾把社会史研究作为一个对立的领

[20] 对此,可参阅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落和病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疾病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21] 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特别是 pp. 1-30, 167-193, 309-337。同时亦可参阅约翰·伯纳姆著,颜宜蓂译:《什么是医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37页。

[22] 比如 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rta E. Hanson, *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等。另外梁其姿的在美国出版新著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和她与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合编的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也明显体现出了新文化史研究取向。

[23] 参阅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域,并进而推衍、建立新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和课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实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延伸而出的。”^[24]实际上,大陆不少较早的具有新文化史倾向的研究,不仅是在社会史发展脉络中展开的,而且还往往以“新社会史”的名目出现。^[25]而此后的有些相关探索,则干脆称之为“社会文化史”。尽管目前国内史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解并不一致,不过应该与国内的新文化史研究乃是社会史研究的自然延伸,两者存在着密切甚至界限模糊的关系不无关联。

前面谈到,在大陆,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主要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展开的,而且在出现之初,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还并不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了解。本文开头提到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虽然被视为国内该新兴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而受到广泛的好评,至今也仍受到持续的关注,不过此书显然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缺乏自觉意识,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内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这样说,不是说我们认为一部著作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而是希望藉此一斑来管窥当时国内的医疗史研究的理论意识,以及表明,若拓展视野,这样的题目其实还有不小的开掘深度和别样的书写模式。^[26]不过,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内史学界只有很少的研究者从事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但转变却已渐渐地开始,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成果中,就出现了若干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作品。杨念群是国内较早具有一定新文化史理念、并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他在上个世纪末就推出了数篇颇具分量的医疗史方面的论文,较为关注“地方感”和医学中的政

[24] 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载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5] 比如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孙江、黄东兰等主编“新社会史”连续出版物第1—3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2006年)。这些论文集,无论从编纂者的标题涉及还是实际内容,都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色彩。不过编纂者和作者很多都是社会史领域的重要人物,而且也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于社会史的名下,只不过有所创新而已。

[26] 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发现后来出现很多有关疫病或传染病的论著,往往走不出该书确立的研究和书写模式。

治和文化权力等问题。^[27] 他于2001年编纂出版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精选集》这一具有一定新文化史取向的论文集，就包括了《“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等医疗史方面的论文，进而又于2006年在“新史学”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再造“病人”》^[28]一书，这一被视为另类的医疗史论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该书并没有直接宣称自己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但从其对医疗背后的政治运作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书写上对深描法的努力实践、对不假思索地将西方视为现代标准的警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呈现等，无不展现出了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稍后，笔者也很快在相关学术史探讨的论文提出自己的省思：

由于疾病、医疗直接关乎人之生老病死这些与生命最密切相关的内容，故而笔者在撰写那篇介绍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文章时，毫不犹豫地写了《关注生命》这一题目。然而，当论文刊出后的一天，笔者突然感到疑问，以往自己和国内其他同仁所作所谓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果真是关注生命吗？反躬自省，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的面相和勾勒社会的变迁，即使涉及到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的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29]

进而倡导从身体史出发展开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30] 之后又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该著前言中提到：

在当前的学术情境中，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若研究者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体现出一种新意来，那自然就会更具意义。实际上，相关的研究

[27] 杨念群：《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及其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创刊号；《“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

[28]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 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6—737页。

[30]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可参阅王涛潜：《“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张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21日。

者若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引入和实践能够采取积极的开放态度,也必然会对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如果我们能够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就会发现颇具意义但以前却不被注意的研究课题……^[31]

明确倡导在疾病医疗史研究中引入新文化史理念与方法。与此同时,一些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比较年轻的学人也开始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引入这一研究方法,比如张仲民关于晚清卫生书籍的研究^[32],陈昊对中古医学、身体经验和身份认同的探讨^[33],路彩霞有关清末京津卫生观念和机制的新著,也部分显现了这样的追求^[34]。而胡成有关卫生史的系列论文,虽然似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理念,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对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35],也展现出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除了论著,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值得关注的论文。^[36]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在以“新社会史”和“新史学”命名的出版物中,医疗史的相关研究均未曾缺席。^[37]

根据近十多年来身处其中的观察和体验,我们感觉国内史学界对疾病医疗的关注呈日渐增强之势,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开始加入到这一研究阵营中来。这自然让人对这一研究的前景感到某种乐观。不过若全面地观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则不能说,虽然医疗史研究很自然被不少研究者归入“新史学”的范畴,但实际上,研究者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五花八门,相当多甚至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其实相当传统,颇为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把握。胡成曾对有些发表在国内顶尖刊物的论文批评说,尽

[31] 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32]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33] 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唐代至北宋前期医学文化史述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34] 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35]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4—232页;《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等等。

[36] 比如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文史哲》2005年第2期;于赓哲:《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杜丽红:《西方身体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2009年第3期,等等。

[37] 比如孙江、黄东兰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连续出版物第1—3辑,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1—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等。

管“选题值得称道,但由于没有参照西方较为成熟的认识,难免存在不尽专业之处”。^[38] 比如就卫生史研究来说,虽然有些人将其归于“新史学”的名下,但大多数的研究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积极意义缺乏基本的理念自觉,对通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局限以及近代“卫生”复杂性和现代性缺乏必要的省思,更没有去认真地思考卫生这一现代话题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涵。^[39] 就整体而言,显然与西方乃至港台的相关研究有着比较明显的区隔。对此,张仲民曾就卫生史研究谈到:“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近代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总体上有一个鲜明差别: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近来某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特别是在研究台湾、上海的卫生史、医疗史时,一般都会注意到卫生与医疗此时不仅代表现代性与文明的方面,同样也会强调其背后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因素;中国大陆的许多研究者,则多强调西方的‘卫生’及‘医疗’带来的现代化与文明特质,基本不提或很少提及‘卫生’和‘医疗’的殖民现代性色彩。”^[40] 当然海外卫生史研究的特点并不限于“殖民现代性”一个方面,不过就此便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的一些名之为“新”的研究,其实只是新在题目,而并未在理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西方乃至港台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中普遍被采用的新文化史理念和方法,在国内,还只是为少数研究者所关注和践行。

当然,这里指出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较少新文化史视角的探讨,不是说,新文化史视角是该研究唯一正当的选择。毫无疑问,研究视角和方法本身并不应成为某一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标准,任何历史研究,只要其能立足资料对历史状貌做出合乎逻辑的新发现,就自有其学术贡献。正如 Huisman 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医疗史研究来说,坚持理论和方法上适切的多元主义是十分重要的。^[41] 实际上,任何的理念和方法都自有其限度。比如梁其姿有关麻风病的英文新著,虽然其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为中国疾病史的书写确立了新的典范,但这一视角也让该著回避了一些问题,对于那些特别希望了解麻风病在中国历史上流行、分布情况或中医对治疗麻风病真实效验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意犹未尽之感。^[42] 毫无疑问,新文化史研究不

[38] 胡成:《疾病史医疗史研究漫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6日。后来他又撰文做进一步的讨论,参阅胡成:《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39] 参阅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40]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第93页。

[41] 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p. 3.

[42]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该著的英文书评很多(可参阅后述中文书评),最新的中文书评可参阅杨璐玮、余新忠:《疾病的社会文化史书写——评梁其姿〈从痲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待刊稿)。

是万能的,它同样有着种种的局限和困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相对成熟和深入的研究理念和成果,闭门造车,高谈创立“中国特色(风格)”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和消化吸收西方走在前面的学术理念、方法和具体研究成果,而奢谈创立自己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那可能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近年来,虽然国内史学界对国际学术发展的关注和引入较之前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还远没有达令人稍感满意的程度,胡成教授最近通过与日本和台湾情形的对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目前国内史学界在走向世界方面的巨大差距。^[43]显然,在引入和学习西方的史学思潮和成就上,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故而,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44]医疗(医学)文化史的研究在西方已经开展有年,蔚成风气,毫无疑问已经积累了足够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成就,且不论具体的研究方法,至少可以让我们较为真切地感知到以下两点在国内医疗史研究中还不太被意识到的共识:一是现代生物医学和公卫机制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并非不言自明,它的不断进步将能解决人类主要甚至全部的健康问题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迷思;二是疾病和医学并不仅仅是对生物世界秩序的客观反映,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疾病的命名、诊断和治疗中,从来都未曾缺席。如果能秉持这样的认知,那必然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医疗问题,并为当今医疗卫生体制建设中引入西方的制度提供批评性视角和可资反省的历史资源。不仅如此,立足史料和中国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从内部思考和洞察新文化史研究理念和优势和不足,众多以往不被关注的历史面相(比如疾病体验、疾病概念和医疗观念的文化意涵、疾病和医疗认识背后的文化权力等等)以及这些面相对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价值,进而在全球历史背景中凝练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经验。^[45]由此可见,借助这一读本,有意识引入和倡导新文化史视角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对积极推进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乃至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更新都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

在当下中国史学界,或许出于对直接借用西方理论的警惕,研究者似乎比较

[43] 胡成:《我们的中国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以台湾地区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镜鉴的思考》,《史林》2011年第5期,第165—177页。

[44] 李剑鸣在最近有关“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笔谈”中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说:“目前,研究条件正在逐步改善,我们如果想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就向欧美史学取法仍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并进而从新文化史入手论述了对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的探索(《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45] 在这方面,前揭梁其姿有关麻风病的新著做了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探索,值得重视。

少直接使用新文化史这一概念,而往往名之为“社会文化史”,不过目前史学界在使用“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时,不同人在认识上似乎还有较大的差异,刘志琴、李长莉和梁景和等一些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于国内社会史和文化史兴起不久时,就颇具创意地提出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当时西方新文化史尚未引入国内,故而不可能与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原本都从事文化史研究,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可能是出于对日渐兴盛的社会史研究的回应,希望借此表明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要更多地关注文化的社会背景和非精英的文化,注重对社会生活的探究。^[46]而最近以来的一些讨论,虽然注意到西方的新文化史,并认可其意义,但出于对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学意识的拒斥,往往用“社会文化史”来表示对西方新文化史的修正。^[47]这些研究者意识中的社会文化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引入社会史方法的传统的文化史,虽然重视下层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但缺乏或并不认同文化批评的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以及对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的探寻等,与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而出现的新文化史有很明显的差异。而另一些从事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则从社会经济出发,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进入到社会文化的层面,注重对历史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索。^[48]他们有时也使用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不过似乎将其当作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一种结合和折中,比如刘永华写道:

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或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49]

这样的界说固然相当周延,但似乎失去了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冲击下出现的新文化史原本所具有的张力和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冲击力。故而,我们更倾向将

[46] 对此可参阅刘志琴:《青史有待星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梁景和、姜虹、张弛:《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另外也可以参阅常建华对这一取向最新的述评(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47] 如以下论文多少表现出了这一意识,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罗检秋:《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48] 相关述评可参阅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49] 刘永华:《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编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7页。

社会文化史视为新文化史在国内学术背景中的新称呼。而之所以如此称呼,一者是因为如前所述,国内的新文化史研究乃是社会史研究的自然延伸。二者也是因为,尽管我们对历史研究中话语的解读、意义的追寻和诠释、表象背后权力关系的探究以及“现代性”的省思等的重要性,深为认同,但也并不愿意就此放弃对呈现一定限度内的“真实”历史经验和过程的努力,并认为,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依然是理解意义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尽管并非单向的,也未必是决定性的。^[50]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本书能成为一座引导国内更多年轻学人接触、了解和实践医疗社会文化史的桥梁。作为一本入门读物,我们的选编可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学术理念的偏好、入选论文代表性不够等等,这些都有待各位专家同仁不吝赐教,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补正。但不管怎样,我们都真诚地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学人投入到新兴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中来,有越来越多该领域的研究者关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进而推动国内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余新忠

2012年4月20日初稿

5月23日改定于剑桥

[50] 我们的概念似乎与李志毓相关论文中的表述比较接近。参阅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目 录

导 言

- 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 余新忠(I)

观念与方法

从边际制造意义

- 新文化医学史 玛丽·E. 费塞尔(3)

情境中的医学

- 医学史研究述评 朱迪斯·W. 莱维特(25)

- 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 卢德米拉·乔丹诺娃(41)

诊断的暴政

- 特殊疾病与个体体验 查尔斯·罗森伯格(64)

增强医师的时间感、地方感与实践感

- 面向医师的中国医学史工作坊 韩 嵩 安迪·帕姆(82)

医疗史与“现代性”

-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梁其姿(109)

从社会到生命

- 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余新忠(132)

中国海关与国际化之脉络

- 以检疫制度为中心 饭岛涉(163)

19 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

——以《啖咭喇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

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 张嘉凤(175)

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1895—1937) 吴 章(217)

1949 年前中国的医学、性病与卖淫 安克强(245)

问题与视野

“大黄迷思”

——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 张哲嘉(273)

医生与病人

——明代的医病关系与医疗风习 邱仲麟(314)

女体与战争

——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 蒋竹山(350)

习惯成四维

——新生活运动与肺结核防治中的伦理、家庭与身体 雷祥麟(368)

“清洁”、“卫生”与“保健”

——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 刘士永(403)

“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 杨念群(439)

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杜丽红(460)

延伸阅读书目 (482)

编后记 杜丽红(488)